

##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王卫东 白云丽 罗仁福 张林秀\*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5省25县100村2000户中国农村发展长期跟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教育)以及政治资本(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2004-2015年期间,教育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外出就业均有促进作用,且教育对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要大于男性。政治资本虽然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但这种影响在逐年下降。政治资本也使得农村劳动力更可能从事本地非农工作。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同时,也应该致力对农村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减少农村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政治资本 非农就业 外出就业

### 一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的

\* 王卫东,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wangwd.15b@igsnr.ac.cn;白云丽(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电子邮箱:baiyl.11b@igsnr.ac.cn;罗仁福,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电子邮箱:luorf.ccap@pku.edu.cn;张林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电子邮箱:lxzhang.ccap@igsnr.ac.cn。作者感谢北京林业大学新进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我国农村居民职业代际传承研究”(批准号:BLX2019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迁徙及其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批准号:71333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农户兼业行为的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批准号:7190318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非农就业对老年人参与务农的影响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应对策略机制研究”(批准号:71703141)的资助。

同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陈斌开、张鹏飞，2010；李实、朱梦冰，201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2.57扩大到2019年的2.64。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城乡统筹发展以及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提高农村居民非农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中国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增长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贾朋等，2016；王德文、蔡昉，2006）。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农收入之和占据总收入的78.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20.0%上升至2018年的41.0%<sup>①</sup>。

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标志之一。盛来运（2008）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外出劳动力不到200万人；而2017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达到了1.72亿人<sup>②</sup>。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4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重为12.0%。另外一项采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2011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达到61.0%（Li et al., 2013）。

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对于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具有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行对于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意义重大（Li et al., 2013；Zhang et al., 2002），是其不断完善的重要表征；而劳动力市场是否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行状况。教育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通常是表征个人能力的关键指标，这一指标也被雇主用来判断个体劳动力的生产率情况（Spence, 1973；Riley, 1979）。因此，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发挥作用已经被作为诊断劳动力市场是否有效运行的重要准则（Zhang et al., 2002；De Brauw & Rozelle, 2008；Wang et al., 2019）。政治资本则更多地被认为是非市场化的因素，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作用越强，表明劳动力市场越不健全（Guang & Zheng, 2005；Wang et al., 2016）。

尽管有研究已经关注人力资本以及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无法观察该影响的时间趋势。同时，关注人力资本以及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研究，也多是采用局部区域小样本进行分析，不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将采用多期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调查数据分析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

① 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需要说明的是，199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纯收入，2018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为可支配收入，该统计口径自2013年开始发生变化。

② 来自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其时间趋势，基于此来判断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以下内容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使用的数据、计量模型构建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 二 文献综述

改革初期，大量研究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否出现并探讨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研究结论不一。一些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差并且障碍重重（Benjamin & Brandt, 1997; Liu et al., 1998）。然而，其他的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地改进，并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Cook, 1999; Rozelle et al., 1999; Knight & Song, 2003）。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判断其在劳动力市场中是否发挥作用，以此来推断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然而，已有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在农村改革初期非市场化因素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起到主导作用，人力资本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Meng & Kidd, 1997; Mallee, 2000）。Zhao (1999) 采用四川调研的微观数据研究了不同受教育水平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状况。结果表明，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外出概率比未上学的高，但差异并不明显；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没上过学的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概率差不多。盛来运 (2007) 认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教育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持乐观的预期。Zhang et al. (2002) 采用1988年、1992年以及1996年江苏省农村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在1988年教育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在之后的年份中教育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并且该影响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强。De Brauw et al. (2002) 利用全国6省1199户农户在1981年到2000年间的就业历史数据研究发现，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劳动力外出就业，同时也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从事工资性工作，但是对个体从事自营工商业没有显著的影响。Knight & Song (2003) 采用1995年对8省400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从事乡村工业生产以及外出非农工作。Li et al. (2005) 基于2000年6省调研数据的研究结论，也体现了教育在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方面的促进作用。在之后也有研究表明，教育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有积极的影响（Zhang et al. , 2008；程名望、潘焯，2012）。

政治资本作为非市场化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备受研究者关注。Zhang & Li（2003）采用河北省和辽宁省的农村调查数据发现，家庭中有村干部比多受一年教育对劳动力获得高收入非农工作的影响要大。Guang & Zheng（2005）利用1996年农村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家庭中有村干部对劳动力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外出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影响都很小，但是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当地从事自营工商业活动。Zhang et al.（2012）研究发现家中有村干部的劳动力更可能在当地从事工资较高的非农工作；然而，这样的劳动力更不可能外出就业。Wang et al.（2016）则发现，政治资本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当地从事白领类工作以及自营工商业有积极的影响。这些研究多认为政治资本能够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以便家庭成员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这种本地化的政治资本主要对当地就业起作用。

### 三 数据、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一）研究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农村发展调查（China Rural Development Survey, CRDS）。该数据为追踪调查数据，调查的年份为2005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每次调查均收集了上一年度的信息。2005年4月项目组进行首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抽取了5个省25个县50个乡镇100个村。抽样步骤如下：项目组根据农业生态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在除去直辖市和西藏等非传统农业区域后，将全国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为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北部和中部地区（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江西省）、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每个区域随机抽取1个样本省。抽取的五个样本省份分别为：吉林省、江苏省、河北省、陕西省和四川省。

选好样本省后，按照人均工业总产值将省内所有县（市）进行降序排列，然后使用等距抽样法抽取5个县。在每个样本县，先将各乡镇按照人均工业总产值排序，然后分为高低两组，在每组随机抽取1个乡镇作为样本乡镇。在每个乡镇，按照人均纯收入将行政村分为两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在每个组内随机抽取1个行政村。在

每个样本村,调查员根据农户花名册随机抽取20户。最终调研对象为2000户农户(5省\*5县\*2乡\*2村\*20户)。在2005年,项目组仅对每个村的8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其余农户参加小组访谈。因此,2005年的问卷调查农户共计800户。在2008年4月、2012年4月和2016年4月项目组对2005年抽取的2000户样本进行了三轮跟踪调查,每轮跟踪调查均采用问卷的方式收集信息。若样本户因过世、永久性外迁而且经过努力无法成功追踪调研时,调研员将在该村剩余农户中,重新随机选取同等数量的农户从而保证每个村的样本量为20户。

考虑到在农村地区并没有实际的退休年龄,大量的超过正规部门规定的退休年龄的农村居民仍旧从事农业或非农生产活动,本文按照国际惯例,将劳动力年龄限定在16~64周岁。同时,本文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正在上学的个体从样本中去除。最终,2004年、2007年、2011年以及2015年的个体样本量分别为2164、5354、5729和4810。

## (二) 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本文将个体从事非农就业情况作为因变量。由于因变量的取值为二元离散变量,因此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其模型设定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Edu_i + \beta_2 Pol_i + \beta_3 X_i + \beta_4 Pro_i + u_i$$

其中, $i$ 表示劳动力个体, $Y$ 代表的是个体非农就业情况,用调查年份是否从事非农就业以及是否外出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及以上两个指标测度。与其他研究一致,本文的非农就业包括从事自营工商业以及工资性工作(Li et al., 2013; Zhang et al., 2018);外出就业指劳动力到乡镇以外的地方就业。 $Edu$ 代表个体的受教育年限,用来表征人力资本水平。 $Pol$ 表示个体的政治资本;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以个体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表征政治资本(Guang & Zheng, 2005; Wang et al., 2016; Zhang & Li, 2003)。 $X$ 表示个人及家庭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Zhang et al., 2002; 邓蒙芝等, 2011)、家庭特征(程名望、潘焯, 2012; 熊瑞祥、李辉文, 2017)。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有老人、是否有小孩以及家庭耕地面积。 $Pro$ 为省份虚拟变量, $u$ 代表随机扰动项。 $\beta_1$ 、 $\beta_2$ 是我们需要估计的核心参数,其分别代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个体非农就业的影响。模型中用到的变量详见表1。

## (三)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不断提升。2004年

52.0%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在2015年这一比例迅速提升至66.4%。在2007年-2015年期间非农就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2004年-2007年。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非农就业比例的提升，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也在快速上升。2004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为24.9%，2007年该比例突破30.0%；到2015年，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已经达到42.7%。分阶段看，2004-2007年期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长速度较快，大约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而在2007-2011年期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每年增加1.4个百分点；2011-2015年期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长速度略有反弹，每年增加1.6个百分点。

同时，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也在此期间获得了持续提升。2004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9年，2015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8年。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占比从2004年的12.3%提升至22.8%。与之变化趋势相反的是，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的比例出现了先增长后下降的情况，这可能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变化有关。与中国人口结构一致，劳动力的年龄逐渐增大，男性劳动力比例要略高于女性。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2004年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被解释变量				
是否从事非农就业(1=是; 0=否)	0.520	0.532	0.607	0.664
是否外出就业(1=是; 0=否)	0.249	0.309	0.365	0.427
核心解释变量				
受教育年限(年)	6.885	7.291	7.539	7.952
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1=是; 0=否)	0.435	0.403	0.377	0.333
初中受教育程度(1=是; 0=否)	0.442	0.452	0.449	0.438
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1=是; 0=否)	0.123	0.145	0.174	0.228
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1=是; 0=否)	0.079	0.151	0.138	0.110
其他变量				
年龄(周岁)	39.936	40.901	41.496	42.674
年龄的平方	1763.418	1851.604	1902.985	1988.762
男性(1=是; 0=否)	0.522	0.520	0.522	0.551
家庭劳动力人数(个)	3.425	3.700	3.711	4.184
家庭中是否有64岁以上人口(1=是; 0=否)	0.198	0.226	0.229	0.392
家庭中是否有6岁以下人口(1=是; 0=否)	0.253	0.237	0.313	0.347
家庭耕地面积(亩)	5.894	6.818	6.796	7.269

续表

变量	均值			
	2004年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河北省(1=是; 0=否)	0.189	0.187	0.169	0.189
江苏省(1=是; 0=否)	0.208	0.210	0.205	0.200
四川省(1=是; 0=否)	0.205	0.184	0.204	0.203
陕西省(1=是; 0=否)	0.197	0.210	0.214	0.219
吉林省(1=是; 0=否)	0.201	0.209	0.208	0.19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2005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关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非农就业的初步关系（图1），可以发现，各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均在提升，且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也就越高。在2004-2015年间，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从33.1%提升至42.8%；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从63.0%提升至73.7%；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一直处于最高水平，且从2004年的79.3%上升至2015年的86.9%。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提升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的体现。同时，受教育水平与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总体上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完善。但也要注意，在2004-2015年期间，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高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不断加大这一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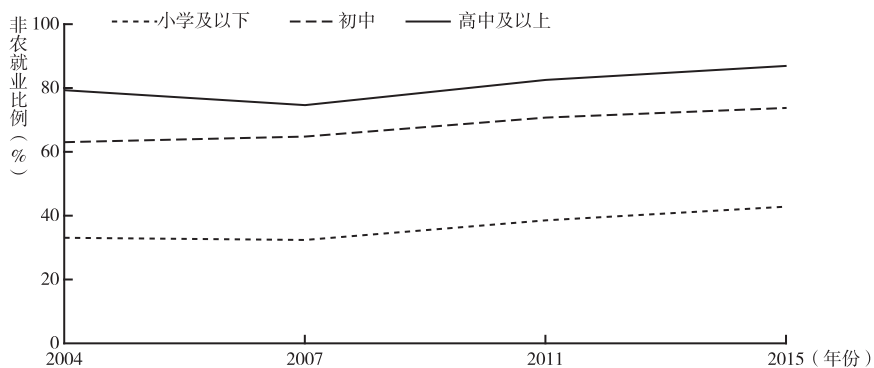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教育层次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2005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无论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担任村干部，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都在明显提高。同时，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要高于那些家庭中没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然而，二者之间非农就业比例呈现趋同（图2）。具体而言，在2004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高出家庭中没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15个百分点，但这一差距在2015年已经缩小至不足5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非市场化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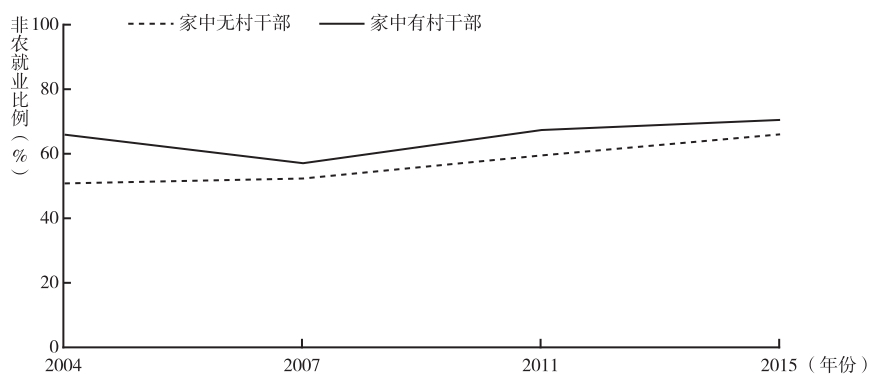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政治资本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2005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外出就业的比例也就越高。从图3可以看出，高中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高于那些仅接受过初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更远高于那些仅接受过小学及以下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另外，各教育阶段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均在快速提升，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提升幅度越大。小学及以下、初中以及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2004年外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15.9%、31.5%及44.0%，2015年该比例分别提升至23.8%、47.0%以及62.1%。

根据图4可以发现，无论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担任村干部，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例均有所提升，然而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低于家庭中无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变大。具体而言，在2004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例为23.5%，2011年这一比例提升至33.4%；2015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小幅下降至33.1%。与此同时，家庭中没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持续攀升，从2004年的25.0%提升至2015年的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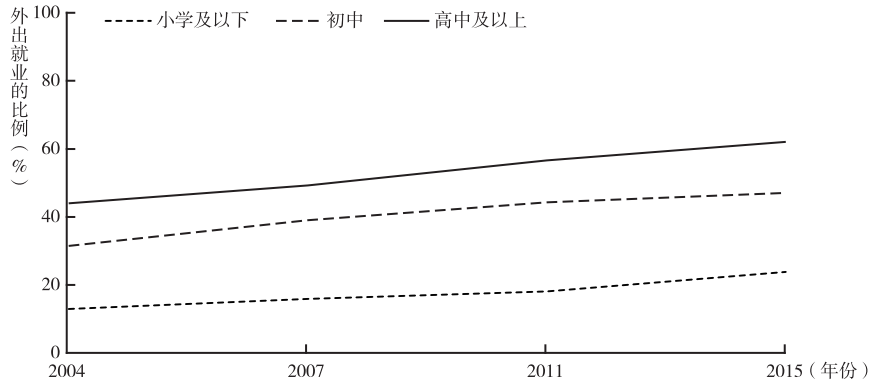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教育层次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2005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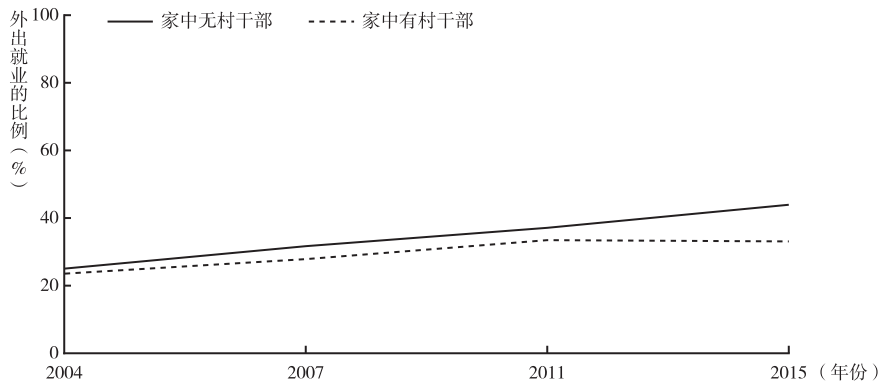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政治资本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2005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综上所述，自 2004 年以来，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均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外出非农就业存在显著且持续的正向相关关系。政治资本虽然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其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正向关系在逐渐地减弱。同时，政治资本也不能推动劳动力外出就业。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证实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呈现有效健康发展的趋势，即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发挥作用，政治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下降。

## 四 实证分析

### (一)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表2呈现了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反映了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当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时，比如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数目、家庭耕地面积等，边际效应表示解释变量平均变化一个单位，个体非农就业的概率的变化。当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时，比如个体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个体性别等，边际效应表示为个体非农就业的概率在两个群组间的差异。

表2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工作的影响（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1 = 是; 0 = 否)			
	2004 年	2007 年	2011 年	2015 年
受教育年限	0.023 *** (0.003)	0.022 *** (0.002)	0.019 *** (0.002)	0.022 *** (0.002)
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领导	0.156 *** (0.033)	0.067 *** (0.017)	0.083 *** (0.016)	0.061 *** (0.018)
年龄	-0.010 ** (0.005)	-0.001 (0.003)	0.010 *** (0.003)	-0.007 * (0.004)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0.000)
男性	0.221 *** (0.017)	0.227 *** (0.011)	0.241 *** (0.010)	0.154 *** (0.011)
家庭劳动力人数	0.029 *** (0.009)	0.017 *** (0.005)	0.010 ** (0.005)	0.012 ** (0.005)
家庭中是否有 64 岁以上老人	0.041 * (0.023)	0.041 *** (0.014)	0.022 * (0.013)	0.044 *** (0.012)
家庭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儿童	-0.080 *** (0.021)	-0.043 *** (0.014)	-0.035 *** (0.012)	-0.042 *** (0.013)
家庭耕地面积	-0.021 *** (0.002)	-0.010 *** (0.001)	-0.007 *** (0.001)	-0.003 ** (0.001)
河北省	-0.014 (0.029)	0.058 *** (0.020)	0.041 ** (0.019)	0.132 *** (0.022)

续表

解释变量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1 = 是; 0 = 否)			
	2004年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江苏省	0.090 *** (0.030)	0.123 *** (0.021)	0.119 *** (0.019)	0.210 *** (0.023)
四川省	-0.020 (0.032)	0.020 (0.022)	0.003 (0.020)	0.168 *** (0.027)
陕西省	-0.099 *** (0.031)	-0.059 *** (0.022)	-0.026 (0.019)	0.076 *** (0.025)
观测值	2164	5354	5729	481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2005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2004 年到 2015 年期间，教育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一直存在积极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可以使个体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提高 2.0%。这体现了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性。家庭中有村干部在 2004 年到 2015 年间也一直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保持着积极的影响，这也表明非市场化的因素仍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作用。然而，与描述统计结果一致，该影响在逐渐降低，这也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非市场化因素的作用在降低，农村劳动力市场在逐渐完善。具体而言，2004 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比家庭中没有人担任村干部的个体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高 15.6%，到 2015 年高出的比例为 6.1%。比较个体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的系数也可以得出，在 2004 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相当于个体多接受了 6.8 年教育，而 2015 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仅仅相当于个体多接受了 2.8 年教育。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预期保持一致。男性比女性劳动力更可能从事非农工作。家庭中劳动力数目越多，个体参加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家庭中有 64 岁以上的老人，个体更可能从事非农工作，可能的原因是，家庭中有老人可以帮助照顾孩子，从而减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顾虑。家庭中有 6 岁以下的儿童，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劳动力参加非农就业的概率越低，但是家庭耕地面积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抑制作用在降低，这可能得益于农业机械化以及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 (二)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非农就业影响的性别差异

进一步分析教育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的性别差异发现（表 3），教育对不同性别

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 2004 年 - 2015 年间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女性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大于男性。这也表明从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看，投资女性教育更有利可图。上述结果的可能解释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致，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不断地发展壮大，对于非熟练工人，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农村男性劳动力仅仅依赖体力就能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女性在从事体力依赖型的工作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让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留在家中，而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女性劳动力能够更好地从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

表 3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不同性别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工作的影响（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1 = 是; 0 = 否)							
	2004 年		2007 年		2011 年		2015 年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受教育年限	0.026 *** (0.004)	0.020 *** (0.004)	0.024 *** (0.002)	0.019 *** (0.003)	0.021 *** (0.002)	0.015 *** (0.002)	0.026 *** (0.002)	0.017 *** (0.002)
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领导	0.125 *** (0.046)	0.192 *** (0.049)	0.066 *** (0.024)	0.069 *** (0.024)	0.072 *** (0.025)	0.094 *** (0.022)	0.016 (0.028)	0.100 *** (0.024)
年龄	-0.020 *** (0.007)	-0.002 (0.007)	-0.013 *** (0.004)	0.010 ** (0.004)	-0.004 (0.004)	0.021 *** (0.004)	-0.018 *** (0.006)	0.003 (0.005)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
家庭劳动力人数	0.049 *** (0.012)	0.010 (0.012)	0.018 ** (0.008)	0.016 ** (0.007)	0.019 ** (0.008)	0.001 (0.006)	0.016 ** (0.008)	0.010 (0.006)
家庭中是否有 64 岁以上老人	0.035 (0.033)	0.043 (0.033)	0.042 ** (0.020)	0.035 * (0.019)	0.031 (0.019)	0.008 (0.017)	0.073 *** (0.018)	0.015 (0.015)
家庭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儿童	-0.094 *** (0.031)	-0.063 ** (0.030)	-0.072 *** (0.020)	-0.018 (0.019)	-0.097 *** (0.019)	0.015 (0.016)	-0.091 *** (0.020)	-0.006 (0.016)
家庭耕地面积	-0.021 *** (0.003)	-0.021 *** (0.003)	-0.010 *** (0.002)	-0.010 *** (0.001)	-0.008 *** (0.002)	-0.005 *** (0.001)	-0.003 (0.002)	-0.003 *** (0.001)
河北省	-0.037 (0.043)	0.012 (0.039)	0.010 (0.029)	0.103 *** (0.028)	0.045 (0.029)	0.042 * (0.024)	0.101 *** (0.036)	0.155 *** (0.023)
江苏省	0.089 ** (0.042)	0.091 ** (0.041)	0.122 *** (0.029)	0.121 *** (0.029)	0.113 *** (0.028)	0.127 *** (0.025)	0.207 *** (0.037)	0.207 *** (0.024)
四川省	-0.034 (0.047)	-0.002 (0.044)	0.006 (0.032)	0.034 (0.030)	-0.003 (0.030)	0.011 (0.025)	0.138 *** (0.044)	0.189 *** (0.025)
陕西省	-0.120 ** (0.047)	-0.072 * (0.042)	-0.095 *** (0.032)	-0.028 (0.029)	-0.066 ** (0.030)	0.009 (0.025)	0.049 (0.042)	0.092 *** (0.024)
样本量	1034	1130	2572	2782	2736	2993	2160	265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2005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从政治资本在不同性别劳动力间影响的差异性可以看出,无论男女,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家庭政治资本的影响对男性劳动力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劳动力。在2004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可以使男性与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分别提高19.2%、12.5%。2015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仅仅能够使得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提高10.0%,并且对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尽管为正,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有较为传统的家庭观念,致使家庭政治资本所带来的就业信息与机会作为家庭共享的资源会更多地向男性劳动力倾斜,从而带来政治资本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的结果。

### (三)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外出就业的影响

分析人力资本以及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发现(表4),教育始终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推手。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概率提高大约2.0%。家庭中有村干部的劳动力更加可能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工作,这也与之前的研究保持一致(Guang & Zheng, 2005; Zhang et al., 2012),并揭示了这种本地化的政治资本在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家中有村干部对于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抑制作用也在逐渐地增强,在2007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使得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概率下降3.2%,而到了2015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使得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概率下降10.7%。尽管家庭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下降,然而,政治资本在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旧不容忽视。这也表明了非市场化的因素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仍旧影响着劳动力的多方面的决策。

表4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的影响(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是否外出就业(1 = 是; 0 = 否)			
	2004年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受教育年限	0.018 *** (0.003)	0.021 *** (0.002)	0.021 *** (0.002)	0.021 *** (0.002)
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领导	-0.003 (0.028)	-0.032 ** (0.016)	-0.056 *** (0.016)	-0.107 *** (0.020)
年龄	-0.027 *** (0.004)	-0.012 *** (0.003)	-0.005 * (0.003)	-0.008 ** (0.004)
年龄的平方	0.000 ***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男性	0.133 *** (0.016)	0.167 *** (0.010)	0.191 *** (0.010)	0.146 *** (0.012)

续表

解释变量	是否外出就业(1 = 是; 0 = 否)			
	2004 年	2007 年	2011 年	2015 年
家庭劳动力人数	0.015 ** (0.007)	0.036 *** (0.005)	0.032 *** (0.005)	0.030 *** (0.005)
家庭中是否有 64 岁以上老人	0.037 * (0.020)	0.009 (0.013)	0.027 ** (0.013)	0.034 *** (0.013)
家庭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儿童	-0.074 *** (0.019)	-0.029 ** (0.013)	-0.034 *** (0.012)	-0.043 *** (0.013)
家庭耕地面积	-0.005 ** (0.002)	-0.005 *** (0.001)	-0.003 *** (0.001)	-0.003 *** (0.001)
河北省	-0.004 (0.027)	-0.030 (0.019)	-0.072 *** (0.019)	-0.017 (0.021)
江苏省	0.031 (0.027)	0.024 (0.019)	-0.007 (0.018)	0.006 (0.022)
四川省	0.090 *** (0.028)	0.088 *** (0.020)	0.033 * (0.019)	0.092 *** (0.023)
陕西省	0.011 (0.028)	-0.032 (0.020)	-0.073 *** (0.019)	-0.007 (0.022)
样本量	2164	5354	5729	481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2005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 2004 - 2015 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发展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以及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04 - 2015 年间均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女性劳动力中更为明显。同时，以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作为代理变量的政治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也有积极影响，但是该影响在下降；并且政治资本对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4 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相当于劳动力多接受了 6.8 年教育，而 2015 年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仅仅相当于劳动力多接受了 2.8 年教育。同时，

本文得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有积极的影响，而家庭中有村干部的劳动力更可能在本地就业。上述结果都表明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地发育与完善，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非市场化的因素的作用在下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非市场化因素仍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人力资本及政治资本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并出台相关的政策与规划，在普及初中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地区高中及大学的入学率，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政府应当致力于增加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提供就业信息，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现象的发生。

### 参考文献：

-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2010），《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第1期，第36-43页。
- 程名望、潘焯（2012），《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期，第94-99页。
- 邓蒙芝、罗仁福、张林秀（2011），《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5省2000个农户的调查》，《农业技术经济》第2期，第4-11页。
- 贾朋、都阳、王美艳（2016），《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劳动经济研究》第6期，第69-91页。
- 李实、朱梦冰（2018），《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管理世界》第12期，第19-28页。
- 盛来运（2007），《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第2-15页。
- 盛来运（2008），《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 王德文、蔡昉（2006），《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消除贫困》，《中国劳动经济学》第3期，第46-70页。
- 熊瑞祥、李辉文（2017），《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

- CFPS 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 1 期，第 393 - 414 页。
- Benjamin, Dwayne & Loren Brandt (1997). Land, Facto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Historical Evide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4 (4), 460 - 494.
- Cook, Sarah (1999). Surplus Labour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 (3), 16 - 44.
- De Brauw, Alan & Scott Rozelle (2008).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 (1), 57 - 71.
- De Brauw, Alan, 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Jikun Huang & Yigang Zhang (2002).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2), 329 - 353.
- Guang, Lei & Lu Zheng (2005). Migration as the Second-best Option: Local Power and Off-farm Employ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81, 22 - 45.
- Knight, John & Lina Song (2003). Chinese Peasant Choices: Migration, Rural Industry or Farming.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1 (2), 123 - 148.
- Li, Qiang, 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 & Linxiu Zhang (2005). Labor Market Emergence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7 (3), 418 - 424.
- Li, Qiang, Jikun Huang, Renfu Luo & Chengfang Liu (2013). China's Labor Transi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Rural Wages and Employment. *China & World Economy*, 21 (3), 4 - 24.
- Liu, Shouying, Michael Carter & Yang Yao (1998). Dimensions and Diversity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 Dilemmas on the Road to Further Reform. *World Development*, 26 (10), 1789 - 1806.
- Mallee, Hein (2000). Agricultural Labor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Some Observations. In Loraine West & Yaohui Zhao (eds.),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34 - 66.
- Meng, Xin & Michael Kidd (1997). Labor Market Reform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State Sector during the 1980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5 (3), 403 - 421.
- Riley, John (1979). Testing the Educational Screening Hypothe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5), S227 - S252.



- Rozelle, Scott, Guo Li, Minggao Shen, Amelia Hughart &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58, 367 – 393.
- Spence, Michael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3), 355 – 374.
- Wang, Weidong, Yongqing Dong, Renfu Luo, Yunli Bai & Linxiu Zhang (2019). Changes in Returns to Education for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11 (1), 2 – 19.
- Wang, Wen, Qiang Li & Donald Lien (2016). Human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and Off-farm Occupational Choices in R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42, 412 – 422.
- Zhang, Haiqing, Linxiu Zhang, Renfu Luo & Qiang Li (2008). Does Education Still Pay Off in Rural China: Revisi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Wages. *China & World Economy*, 16 (2), 50 – 65.
- Zhang, Jian, John Giles & Scott Rozelle (2012). Does It Pay to Be a Cadre? 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Being a Local Official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 (3), 337 – 356.
- Zhang, Linxiu, Yongqing Dong, Chengfang Liu & Yunli Bai (2018). Off-farm Employmen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n Rural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10 (2), 190 – 214.
- Zhang, Linxiu, Jikun Huang & Scott Rozelle (2002). Employment, Emerging Labor Markets,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2 – 3), 313 – 328.
- Zhang, Xiaobo & Guo Li (2003).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2), 315 – 331.
- Zhao, Yaohui (1999).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 (4), 767 – 782.

## Human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and Off-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Wang Weidong<sup>1</sup>, Bai Yunli<sup>2</sup>, Luo Renfu<sup>3</sup> & Zhang Linxiu<sup>2</sup>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sup>1</sup>;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up>2</sup>;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sup>3</sup>)

**Abstract:** Using panel data from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Survey, with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2000 rural households in 100 villages among 5 provin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capital (whether a family has a member being local cadre) on off-farm employment for rural labo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in 2004 – 2015. Education especially promotes off-farm employment for females. Meanwhile, having village cadres within families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off-farm employment for males, even though the effect has been gradually diminishing. Having cadre connection makes it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local off-farm work. Thus, government should keep adding resources into ru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providing mor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in these areas, therefore correc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distortion of labor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rural labor market.

**Keywords:** human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off-farm employment, mi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23, J24

(责任编辑：一帆)